



安旗
著

我读李太白

三秦出版社

我读李白

安旗 著

三秦出版社

我读李太白

安旗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
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
邮 政 编 码 710003

印 刷 陕西画报社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000

标 准 书 号 ISBN 7—80628—171—1/I · 46

定 价 12.00 元

大鹏飞起来呵，
震动了四面八方。
是它的气力不行么？
从半空中跌落在地上。
它激起的余风，
也够使万代的人们荡气回肠。
天地太小了呵，
右边的衣袖挂着了扶桑，
(那太阳出来的地方)
希望后世之人，
把其中的秘密参详。
仲尼死了呵，
(为盛世写《春秋》的仲尼)
有谁来为他哭一场？

——李白《临终歌》今译*

* 《临终歌》(本作《临路歌》，误)。今译如此，自有说法，见本书《李诗别笺》。

目 录

论李白.....	(1)
莫怪无心恋清境，已将书剑许明时	
——蜀中事迹及作品	(23)
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	
——初入长安始末	(42)
骑虎不敢下，攀龙忽堕天	
——再入长安始末	(56)
良宝终见弃，徒劳三献君	
——三入长安始末	(73)
且探虎穴向沙漠	
——幽州之行发覆	(91)
清水白石何离离	
——“避地剡中”真相	(104)
鱼龙陷人，成此祸胎	
——“从璘”冤案志略	(115)

- 平生无限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消
——李白与佛教 (125)
- 我家寄在沙丘旁
——东鲁寓家地考 (157)
- 有愧叨承国士恩
——元丹丘推荐入朝说 (170)
- 我读《蜀道难》 (178)
- 我读《苦雨》诗 (192)
- 李诗别笺(五则)
《月下独酌四首》《古风二首》《临路歌》
《横江词六首》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
李集编年刍议 (227)
- 评艾龙的李诗英译本
——《Poems By Li Po》 (238)
- 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质疑(一) (246)
- 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质疑(二) (258)

论 李 白^①

(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，传世的约千首，其中绝大部分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，数以百计的名篇杰作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全人类的精神财富。)

但是过去一千多年来对李白的研究很不够。他的生平事迹多不详，他的作品也多有未解或解而有误，致使其人及其作品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和准确的评价，甚至还遭到歪曲。

近十余年来，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，李白研究方面尤为活跃，新说迭出，成果累累，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。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为给李白作出新的介绍和评价提供了基础，本文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略陈管见，作为我个人对李白的基本看法。

① 本文为拙编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》一书前言。巴蜀书社 1990 年初版。

一 关于李白的生平

李白，字太白，生于唐代武则天长安元年（701）。他的活动主要在玄宗、肃宗两朝，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^①。

前期的唐玄宗是一个英明的帝王。他任贤用能，励精图治，使唐帝国达到它的极盛时期，成为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。“开元之治”的阳光激发了许多人的雄心壮志，秉赋优异和富于幻想的少年李白更感到它具有无比的魅力。

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李白二十四岁。他认为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临行，有《别匡山》一诗，诗末写道：“莫谓无心恋清景，已将书剑许明时。”他早已下定决心，要把他的文才武艺奉献给大唐。他之辞亲远游主要就是为了寻求政治出路。

初出三峡的李白好像大鹏展翅。此年所作的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（后改为《大鹏赋》）就是他的自我写照。从此赋中可以看出，李白的政治抱负不是仅仅要取得一官半职，而是要趁着大好时代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开元十五年（715），李白二十七岁，入赘安陆许氏。他在这一年所作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写道：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，然后与陶朱、留侯浮五湖，戏沧州，不足为难矣。”由此可知，李白政治抱负的具体内容是：辅佐时君，

① 李白为世纪同龄人，公元纪年后二位数字即其年龄。

济苍生，安社稷，然后功成身退。

但自出蜀以来，“遍干诸侯”皆无结果，只落得“南徙莫从，北游失路。孤剑谁托，悲歌自怜”。于是李白寄希望于上长安。他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写道：“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，不许门下，逐之长途，白即膝行于前，再拜而去，西入秦海，一观国风。永辞君侯，黄鹄举矣，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？”显然，他以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，上京师去当能如愿以偿。

开元十八年（730）春夏间，李白第一次上了长安。“历抵卿相”仍无结果，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，只落得与游侠儿、斗鸡徒为伍；又因误与“五陵豪”相交，而有北门之厄，受到这一伙军中流氓的围攻。在落魄长安的同时，却看见宦官们甲第连云，斗鸡徒们冠盖辉赫。相形之下，李白大为不平，大惑不解，对他抱有无限希望的“明时”开始感到怀疑和失望。《行路难》（其二）、《蜀道难》等诗即此期抒怀之作。

李白初入长安失败后，无颜回家，乃东游梁宋，访道嵩山，憩元丹丘颍阳山居，然后又在洛阳过了一段“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累月轻王侯”的狂放生活。重要作品有《梁园吟》、《梁甫吟》等诗。后二年出游襄阳，谒见当时颇有推贤进士之名的韩朝宗，求荐又不遂。重要作品有《襄阳歌》、《与韩荆州书》等诗文。开元后期，李白又曾北游太原，南游江淮，重要作品有《将进酒》、《夜泊牛渚怀古》、《惜余春赋》等诗文。

开元二十八年，李白移家东鲁，卜居兗州治城瑕丘东门外二里之沙丘。

开元二十九年秋冬间，李白的挚友元丹丘奉诏入京，次年（即天宝元年）封为道门威仪，随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并受

道王屋山仙人坛。丹丘受李白之托，荐之于玉真，玉真又荐之于玄宗，于是天宝元年（742）秋李白亦奉诏入朝，是为再入长安。玄宗召见金銮，优礼有加，并命待诏翰林。但此时玄宗励精图治之心早已消歇，已经从一个英明的帝王蜕化为一个安乐天子。他之召李白入朝只不过借以装点太平。

李白入朝之初还以为他大展鸿图的美梦即将实现。但一次又一次地奉诏应制却只是侍从宴游，使他又陷入失望；加以受人妒忌，遭人谗谤，更使他感到苦恼。天宝二年夏他已是身在魏阙，心存江湖，天宝二年秋更是咏歌之际，屡称东山。此期所写的一大批宫怨诗，实际多是待诏翰林生活的自况；此期所写的一大批思边诗，实际多是对朝廷穷兵黩武的不满；同时对玄宗的荒淫生活也有所讽刺。从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中“丑正同列，害能成谤，格言不入，帝用疏之”这几句话看来，李白对玄宗曾有过谏诤之言，玄宗不但不采纳，反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。天宝三载春，李白经过多日徘徊以后，终于下定决心，请求“还山”。玄宗亦以其“非廊庙器”（不是当官的料），又虑其“言温室树”（泄漏宫廷秘事），而乘势打发了他。临行，李白不免感慨万端，或咏鹦鹉，或悲流水，或寄喻宫女，或托言弃妇，写了一系列诗篇抒发他痛苦的辞阙心情。当年回到东鲁后，为了借宗教麻痹他创痛巨深的心灵，李白在济南紫极宫受了道箓；又自构酒楼一座，日夜沉饮其上，少有醒时。随后，就大病了一场。

天宝五载病愈后，为了借远游以消忧，李白自东鲁南下越中，行前有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一诗，抒其入朝去朝之南柯梦及幻灭感。

由于唐玄宗荒淫无道，奸相李林甫等人助纣为虐，外则穷

兵黜武，内则屡兴大狱，天宝中期朝政更趋昏暗。李白一连几年滞留吴越，寓居金陵，表面上生活十分狂放，实际上内心却十分痛苦。他既为自己被斥去朝愤愤不已，又为朝政昏暗忧心忡忡。此期一系列览古、怀古之诗实际上都是借古讽今之作；《战城南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等诗更是直抒胸臆，抨击时政。

天宝十载秋，蓄谋已久决心为乱的幽州（范阳郡）节度使安禄山，派人到内地罗致名士，李白将计就计而有幽州之行。实则意欲亲入虎穴，探明禄山反迹，上奏朝廷，以期戢祸乱于未发，而建不世之奇功。故次年岁梢自幽州南返，天宝十二载早春随即有三入长安之行。但到了长安之后，他看到满朝文武犹自歌舞升平，不知危亡已在旦夕；他听到杨国忠一伙狐群狗党窃据高位，而自己却报国无门；他感到玄宗迷而不省，已快成亡国之君；最后只好怀着“辞楚”、“避秦”的心情离开了长安。此行有诗多首，或抒危亡之感，或作穷途之哭，或嗟叹世风浇漓，或决心遁世避祸。但在临行之际和既去以后，却又系心君国，眷恋长安，既对国家命运忧心不已，又以报国无路含恨无穷，因而有《远别离》之作。

是年秋，李白南下宣城。虽然他屡有出世之语，实则忧时之心念兹在兹。《横江词六首》、《古朗月行》、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等诗都是此期忧时伤事之作。

天宝十四载（755）十一月，安史之乱果然爆发。

天宝十五载六月，叛军破潼关，玄宗奔蜀，长安沦陷，大唐濒临灭亡。安史乱起以后，李白又想有所作为，经过一番奔走，终于不能有所作为，而避乱入庐山。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二词当作于此时。这两首词都是抒写怀念长安、哀悼故国之情。

是年七月，太子亨在朔方灵武即位，改元至德，是为肃宗；其弟永王璘则奉玄宗“制置”出镇江陵。次年正月永王璘出兵东巡，派人上庐山征聘李白。李白怀着救国之心参加了永王军幕，不料却堕入统治者们争权夺位的漩涡，竟以“附逆作乱”的罪名入狱，后又被判“长流夜郎”。

长安、洛阳两京收复以后，遇赦放还的李白竟又幻想东山再起，奔走结果只是自取其辱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年，还想去参加李光弼的军队，后因半道病还，未果。

唐代宗广德元年（763），李白六十三岁，卒于当涂。在他绝命诗《临路歌》（应作《临终歌》）中，仍以大鹏自喻，虽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，却对自己的诗歌作了豪迈的预言，并有司马迁所说的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之意。寄希望于后世之人，使其一腔孤忠能大白于天下。

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李白一生的基本情况，其中不少地方和前人的介绍颇有出入。凡有重大出入的地方，可在这部编年全集中得到说明。

二 关于李白的思想

李白的思想，确如一些论者所说，十分复杂，充满矛盾。他集儒、道、释、纵横等各家思想于一身，又好击剑任侠，又想弃文就武，又曾宣扬人生若梦，主张及时行乐，而且被人视为“甘酒好色”。他多次以孔子自喻，却也多次嘲笑孔子，更看不起“白发死章句”的小儒。他热衷于学道求仙，而且受过道箓炼过丹，但他对神仙之事又表示怀疑，说是“仙人殊恍惚，未若醉中真”，甚至说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即蓬莱”，而且多次批

判唐玄宗迷信神仙。他“遍干诸侯”，“历抵卿相”，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，却又多次说要隐居，要出世，要去寻找桃花源。李白的思想真像一个大杂烩，甚至是一团乱麻。

但是，李白的思想在复杂性中自有他的单纯性，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统一性，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穿始终。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：要实现伟大的抱负，要建立不朽的功业。一念之贞，终身不渝，欲罢不能，至死方休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同屈原一样，同杜甫一样，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，他们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热恋，一场苦恋，一场生死恋。这是在为时十年的研究中，李白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。也只有理解他这种思想品格，才能理解他的一切。

李白一生好漫游四方，有人便以为他一生悠哉游哉，超然飘然，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安乐公子、富贵闲人。其实并非如此。

开元天宝中，朝廷虽然屡下求才之诏，但是当时怀才抱艺之士若无适当的人推荐也难有出头之日。孟浩然《田园作》云：“乡曲无知己，朝端乏亲故。谁能为扬雄，一荐《甘泉赋》？”即可见一斑。唐代士人漫游成风，除了其他原因外，主要是为了广事干谒，寻找“知己”。“知己”一词在当时是有特定含义的，即身居要津的官吏中能够识拔自己并荐之于朝廷的人。李白漫游四方也是如此。正是为了寻找能够识拔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，为了寻找政治出路，他长年在外奔走不息。他对故乡“清景”无限依恋，但却辞亲远游，一去忘返。他和许氏夫人伉俪情笃，《寄远十二首》（大部分是赠内诗或自代内赠）写得缠绵悱恻，但他一外出就是两年三年不归。他对子女充满了父爱，《寄

《东鲁二稚子》等诗可谓舐犊情深，但他却长年抛下他们。他和续娶的宗氏夫人志同道合，但新婚宴尔他就跑到龙潭虎穴去冒险。《公无渡河》一诗中“披发提壶，乱流而渡”的“白首狂夫”，就是满怀济世热情的李白自己。即使在居家时写的一些闲适诗中，我们也可以感到有一种思想感情在他心中起伏，回旋，激荡。这就是深恐辜负明时，虚度此生。因此早在三十几岁他就屡悲白发，颇惜余春，“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，系此西飞之白日。”即使他在闭门读道书，静谈《秋水篇》时，他心里未必真正安静过，转眼之间又可能热血沸腾。他的政治抱负和用世热情使他不得安生，在唐帝国的广大国土上，在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上，他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奔波，寻觅，追求，奋斗。

固然，李白一生确实游了不少名山大川，写了不少优美的风景诗，但风景诗只不过是他的副产品。他在《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》中写道：“每思欲遐登蓬莱，极目四海，手弄白日，顶摩苍穹，挥斥幽愤，不可得也。”他又在《赤壁歌送别》中写道：“一一书来报故人，我欲因之壮心魄。”他又在《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》中写道：“余方窥石镜，兼得穷江源。将欲继风雅，岂徒清心魂？”可见李白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“壮心魄”，“清心魂”，“继风雅”，“挥斥幽愤”。也就是说，是为了开豁心胸，涤荡灵魂，是为了取得灵感和形象，以抒写他的壮志豪情，以挥斥他幽深的愤懑。

李白正是在漫游中走遍了中国大地，经历了广阔的生活，尝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，亲身感受到大唐的盛衰转折，所以他的创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，有着得心应手的比兴手段，从而能够“开口成文，挥翰雾散”，彷彿如有神助。

有人认为李白是一个“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，苍生社稷曾不系其心膂”的人。其实恰恰相反。

按着年代先后考察李白诗歌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：开元前期，唐帝国阳光灿烂，李白诗歌中也呈现出一派天朗气清、风和日丽的景象。《峨眉山月歌》、《初下荆门》、《金陵酒肆留别》、《越女词》诸作最为典型。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感慨，更无牢骚，即使抒写离情别绪也使人心旷神怡。开元中期以后，唐帝国本来潜伏着的阴影逐渐出现，李白的诗歌中也呈现出明暗交错、悲欢杂糅的色调。《行路难》（其一）、《梁园吟》、《梁甫吟》、《将进酒》诸作最为典型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感慨和牢骚就多起来，但旋发牢骚旋又自慰自解，往往在最后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。天宝中，唐帝国乌云满天，黄风匝地，李白的诗歌中也出现了阵阵闪电和雷鸣。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和《战城南》等诗最为典型。到了天宝季叶，大乱前夕，唐帝国已是危若累卵，祸在眉睫，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忧愤深广的特点，有些诗简直是血泪交织。《远别离》、《横江词六首》、《古朗月行》、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等诗最为典型。李白的诗歌同唐帝国的时政和国运，真是如月在水，如影随形。

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，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。当开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际，他就开始觉察到它的阴影，首先是对朝廷广开才路发生怀疑。他在《行路难》（其二）中大声疾呼：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！”他在《蜀道难》中惊呼呐喊：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他在《襄阳歌》中以“襄王云雨”隐喻朝廷恩泽，而发出“今安在”的质问，都是这种怀疑的表现。他在《孤兰生幽园》（《古风》其三十八）中“虽照阳春辉，复悲高秋月”的感慨，实际上是对朝

廷广开才路的两重性的艺术概括。开元后期唐玄宗渐重边功，屡事征伐，当捷报频传之日，李白不以为喜，反以为忧。他在《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中幽居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君王制六合，海塞无交兵。壮士伏草间，沉忧乱纵横。”他又在《赠从弟冽》中写道：“羌戎事未息，君子悲涂泥。报国有长策，成功羞执珪。”认为屡事征伐不是安边的上策，感到穷兵黩武必将祸国殃民。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朝，虽然由于一时兴奋写了一些“揄扬九重万乘主”之作，但不久他就感到玄宗的耽于淫乐有类吴王夫差，因而写下了《乌栖曲》，表面上极写其欢乐，实际上透露出麋鹿游于姑苏台的预感。天宝十二载三入长安献策失败后，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、祸在眉睫之感，写下了一大批忧时伤事之作，透露出危亡的征兆，甚至说出“明年祖龙死”这样的话，预言玄宗的末日将临。果然两年以后，安史之乱就爆发了。对盛唐时局的转折所产生的不安感、不祥感、倾危感，以及由此而来的忧虑、愤怒和痛心，虽然在唐代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有所表现，但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现得最频繁，最深沉，最强烈。

在这一点上，李白与杜甫多次表现出惊人的一致。天宝中叶石堡一役，暴露出唐玄宗穷兵黩武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他们二人虽然远隔千里，一个在江东，一个在长安，却不约而同地向朝廷的暴政怒飞鸣镝，这就是李白的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等诗和杜甫的《兵车行》等诗。天宝季叶，杜甫登上慈恩寺塔，感念时事，百忧交集，写下“秦山忽破碎，泾渭不可求。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”这样的诗句时，李白也几乎在同时同地写下“殷后乱天纪，楚怀亦已昏。夷羊满中野，菉葹盈高门”这样的诗句。同样的政治预感，同样的忧国情怀，深

深浸透在他们两人的许多作品中。

又有人以为李白思想中存在着入世和出世的矛盾，这种看法也似是而非。并不是说李白没有出世思想，也不是说李白的出世思想微不足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不是在李白思想中一半对一半（也不是以任何比例）静止地对峙着，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遭遇不断地消长着，发展着。总的说来，开元时期李白的出世思想较淡，天宝时期较浓，天宝后期最浓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每一次从政活动之始，他意气昂扬，精神焕发，出世思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；随着情况的转折，出世思想又来到他心里；失败成为定局，沉重的打击降落到他头上，出世思想就似乎充塞他整个心灵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：他常常说着隐居出世之类的话，而又不甘于隐居出世。初入长安失败后，遍登嵩山三十六峰，颇有出世之思，但返安陆途中经过南阳时，崔宗之约他去嵩山隐居，他却说：“但得长把袂，何必嵩丘山？”开元后期的江淮之行途中，邺中王大劝他入高凤石门山中去隐居，他也不肯去，而要“建功及春荣”。天宝三载被斥去朝后，出世思想空前浓厚，甚至受了道箓，但就在次年他又给友人、代理监察御史的崔成甫接连赠诗。诗中写道：“扶摇应借力，桃李愿成荫。”“风涛傥相因，更欲凌崑崙。”在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》诗中，他也写道：“客自长安来，还归长安去。狂风吹我心，西挂咸阳树。”所以注家萧士贊、王琦多次说他“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阙”。去朝十年中，他说是“十年罢西笑”，对朝廷不抱希望了；而且“闭剑琉璃匣，炼丹紫翠房”，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了。但恰在这十年中他写出了大批的借古讽今之作和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这样直抒胸臆、抨击朝政的作品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他即使在